

传统文化与中国人口关系论纲

王跃生

在人类历史上,农业文明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伴随着农业的兴起,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并进而影响到人口的发展。这种情形在世界各主要文明国家都曾出现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人口发展除了受农业文明的影响外,更多地受到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即中国人口的发展过程既打上具有普遍意义的农业文明的烙印,又受到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形态的制约,并且后者的作用至今仍能被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因而很有必要加以探讨。

一、传统文化与中国人口关系的理论体现

文化是以什么方式对一个社会的人口发展产生作用呢?这就涉及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非常同意这样的观点:文化是一个由习俗、传统、道德、信仰、仪式、礼节、礼貌、惯例、制度、理想与价值观相互关联而构成的网络^①。这个定义主要强调,社会的、观念形态的东西是文化的内涵。此种看法类似于美国著名文化学家L·A·怀特教授关于文化系统中的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另一个是技术系统)的观点^②。在我看来,文化这个“网络”(或者“系统”)中的每一个方面都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即它们并不总是以整体的面貌出现。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论,它对人口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表现出来:(1)渗透于民间社会的风俗、礼节,如婚嫁习俗;(2)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的形成的人口观念,如重男轻女;(3)历代政府制订的人口政策,其中表现出强烈的封建意识,如人口职业上的重农

抑商;(4)宗规、族训,这里面有许多对人口行为的限制性措施;(5)封建道德、伦理说教,主要是历代思想家所阐释的观点,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所以将历代政府所实施的人口政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决策者也受到此种文化环境的影响。他们力图将传统的道德规范贯穿于所制订的政策中,以此左右百姓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历代政府的人口政策以法令形式将充满封建色彩的观念、意识向民众贯彻,因而其影响力要大大超过上述其他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这已成为绝大多数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共识。从先秦到近代,特别是两汉以来,各个时期均有人以儒家学说为纲,对中国人口的各个方面发表过见解。并进而成为统治者制订人口政策和广大民众社会行为的准则。因而可以说,把握儒家学说的思维方式是了解中国人口观念行为的一把钥匙。

中国自古迄今一直是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这既是传统文化得以产生和维系的基础,也是它能够广泛发挥作用的原因。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特别是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很少发生变化。与此相适应,传统文化也在持续地对中国人口的发展产生作用。这种影响可谓根深蒂固。

^① (美)M. 辛格:“美国哲学的场景”,载《皇家哲学学会论文集》,见《国外社会科学》杂志,1990年第4期。

^② L·A·怀特:《文化的科学》,第25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人口的发展归根结底受一定历史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具有社会性、意识性特征的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为人口的发展毕竟要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人体现出来。人的行为要受所在时代各种社会规范的影响。并且,文化本身的许多方面具有时代滞后性。即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了,那些看起来与其并不适应的文化内容还要以原有的形式保持下来,产生作用。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表现得尤其显著。况且,现在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中。这就是说,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口发展产生作用的物质条件并没有消除。因而我们就应该对这种状况进行研究。如何将传统文化中那些影响人口发展的陈腐、落后观念清除,或者将其限制在一个尽可能小的范围内,降低其作用,应是我们反思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

二、传统文化与生育的关系

从一般意义上讲,生育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具体来讲,则是人们繁衍后代的行为。就生育本身而言,其自然性特征比较明显。而实质上,社会性因素对生育的影响更大,特别是人们生育的数量、性别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状态。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生产的组织基本上是在一家一户中进行。在生产水平难以提高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增殖财富的主要手段是扩大人口规模,增加劳动人手。由此便形成了人们多育的观念。同时农业社会中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人口的死亡率很高,婴幼儿的死亡率更高,因而多育也是为了增加家庭人口维系的保险度。在中国封建时代,虽然个别王朝曾设立过养济院、敬老院等慈善机构救济、照料孤寡老人的生活,而这对绝大多数老年人的生活并无多大帮助。以明清时代为例,许多州县的养济院只能容纳几十位老人。况且,许多王朝根本不曾建立过这样的组织。因此,年老者主要仍由他们的子孙来承担赡养义

务。人们为了防止年老时的后顾之忧,也要多育。所以,我们认为,农业社会的多育是由增殖财富、减少死亡风险、提高养老保障等因素促成的。“多子多福”的观念因此形成。

多育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早育,而早育又取决于早婚。因而早婚是传统社会中一种普遍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早婚早育这种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的愿望,成为一种习俗;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封建时代统治者推行早婚政策的结果。历代政府往往把人口众寡作为国力盛衰的标志,所以他们或者强迫百姓早婚,或者制订初婚年龄较低的法令,以此鼓励人口增长。先秦时期,越王勾践令,“女子十六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①。汉代惠帝时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②。即加重晚婚者的经济负担。北齐要求:“女子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嫁,悉集省”,由官方强配,“隐匿者家长处死”^③。南朝宋:“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④。唐代贞观元年下诏:“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并须申以婚媾”;开元二十二年又发敕令:“男年十五,女年十六以上,听婚嫁”^⑤。北周建德六年下旨:“自今以后男年十五,女十六以上,所在军民须依时嫁娶”^⑥。宋代沿袭唐开元之制,并酌定为男十六以上,女十四以上。这一规定被朱熹写入《朱子家礼》之中作为家法。而明代则要求百姓婚娶悉依《朱子家礼》。由此可见,两汉以后的王朝多把男十六、女十四作为初婚年龄。刚刚达到中国传统上认为的“男子年十六精通,女子年十四而化”的标准。从现代生理科学角

① 《国语·越语》。

② 《汉书·惠帝纪第二》。

③ 《北史·高允传》。

④ 《宋书·周朗传》。

⑤ 《唐会要》婚嫁。

⑥ 《周书·武帝纪》。

度来看,这个年龄并不是人身体发育成熟的时期,只是具有了一般意义上的生育能力。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观念对早婚、早育的渴望。需要指出,这并不完全是青年男女的愿望,只是他们对习俗、法令的屈从。

严格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并不是泛泛地追求多育,而是把“多子”作为追求目标。因为男子是田间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因而也是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男子是社会事务的主要掌管者,从中央机构到地方保甲,直至宗族,均由男子承担管理职能;男子还是家庭财产的继承者。相反,在封建社会中,女子则意味着贫穷。东汉陈蕃曾说:

“盗不过五女之门”^①。传统的伦理、规范更把女子从一切社会事务的管理部门中排斥出去,以至连继承家产的资格也被剥夺了。美国学者马克·赫特尔指出:“在犁耕农业中,妇女不仅被排除在田间劳动之外,而且也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以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妇女经济职能的丧失由她们的性价值的提高来补偿的局面。其结果是,妇女象囚徒一样随时受到监视,妇女与外界及家庭中的其它成员相隔离就是典型的例证”^②。尽管中国传统社会一向是“男耕女织”的社会,然而妇女的劳动并没有得到社会真正的承认,其社会地位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并没有丝毫改变。

虽然在农耕社会中,世界各个民族均有性别角色的偏好,而象中国这样严重,却属罕见。为了实现多子的目的,官僚、显贵等特权者常常采用婚外纳妾的方式。许多家族规定:“男子至四十岁无子,允许置妾;嫡妻不得妒忌,如不遵此训,照七出条出之”^③。更有甚者,为了多生、早生男孩,保护已生男孩,溺女之习在中国各个时期,各个地区普遍存在。北魏颜之推指出:“世人多不举女,贱行骨肉”^④。这种风气,宋以后至明清达到极盛。如“漳南之俗,止育一女,多则溺之”^⑤。江西分宜县,“贫家生女艰于抚养,富者生

女急于求子,相率隐忍,将女溺毙”^⑥。山西百姓“素称朴厚,而溺女一事竟徇于故习而不能湔除”^⑦。对此,封建政府也一再明令禁止,而其鼓励生男孩的政策又加重了人们对女子的轻视。汉代高祖七年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⑧。即免除徭役二年。南朝齐建武四年下诏:“民产子者赐米十斛”^⑨。清代康熙六十一年谕令:“民间一产三男俱存者,给布十匹,米五石;若男女并产及三女,不准行”^⑩。其重男轻女意识昭然若揭。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中有崇尚多育的特征,但多育的本质还是为了实现多子的目的。

需要指出,中国文化中的这种生育观念很容易造成人口大幅度增长。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家庭生育2~3子常常是较理想的结果。而按一般出生性别比,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生育4~5个子女。由于婴幼儿的高死亡率,又使一般家庭难于达到保有4~5个子女的标准。加之战乱瘟疫的频仍,总人口规模因多育而可能膨胀的势头得到抑止。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大幅度增长的潜力不存在。只要这些制约因素的作用稍有降低,那么总人口规模便会迅速扩大。清代康雍乾时期的相对和平生活,促使中国人口突破1亿、2亿、3亿,直至道光时期的4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几年,人口就突破了近百年徘徊于4亿的局面,迅速达到6亿、7亿、8亿。这足以说明,传统的生育观对人口的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① 《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一。

② 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垮文化的透视》。

③ 吴云《得一录》卷七。

④ 《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一。

⑤ 同③。

⑥ 民国23年《分宜县志》卷14。

⑦ 安颐辑:《晋政辑要》卷13。

⑧ 《汉书》卷1。

⑨ 《南朝齐会要》民政。

⑩ 《永宪录》卷1。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的早婚、早育、多育、多子的文化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它既受到农业文明下的物质条件的制约,又有中国自先秦以来不断迭加的充满繁文缛礼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既有历代政府政策的干预,又有民间社会习俗的制约。站在今天社会角度来看,不难得出结论:这是一种落后的文化观念。而它仍在我们的社会中产生着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文化形成的多样性告诉我们,要消除其影响,仅靠一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认识,只要我们抓住一种因素开展工作,也可以使这种观念的总的社会影响有所降低,而不必去等待整个条件都具备时再去努力。

三、传统文化与人口职业选择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口的基本职业只有四种:士、农、工、商。然而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这四种职业的从事者并没有获得同等的地位。

农业社会中,直接生活资料的获取——田间劳动是主要的职业。而粮食的足缺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主要标志。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状态下,粮食的增长主要靠投入劳动力和广泛垦殖土地。农业劳动人手越多,国家实力越强盛。正如商鞅所言: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①。这种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所接受,形成了长时期奉行不替的重农政策,并得到强有力的贯彻。秦王朝时有输粟拜爵之制,汉代有孝弟力田之奖。明清时向老年农民颁发顶戴(一种荣誉)。灾荒年景,政府还会向农民提供土地、种子、耕牛,人们只要服力南亩、躬耕田野,就能得到官方的褒扬与支持。

与此同时,工商业从事者则被认为不创造财富而受到贬斥。汉高祖时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整个汉代,商贾子弟不得为官^②。北魏时限制百工子弟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只能习其父兄所业,不得

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诛”^③。明代朱元璋更下严旨:“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④。由此,工商业无法得到实质性的发展。一些经营致富的商贾最终把钱财投入至土地上。封建国家采取这种手段抑压工商业,固然有将其从业者驱至田野、扩大粮食生产的本意;同时,按照儒家学说,从事工商是逐利行为,而天下交相争利是国家亡乱的征兆。因而,统治者试图以抑工商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

传统社会中,最受推崇的是“士”。士是封建文献的掌握者,是国家对普通百姓进行教化的依靠力量,他们享有徭役、钱粮的豁免权。更重要的是,士是国家官员的后备军。孟子尝言: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⑤。言外之意,做官是士人的正道和本职。而只有做官才能改变自身地位和家庭境遇。这里应该指出,农业固然是传统社会中一种相对稳固的生存行业。然而,依靠此业,人们很难跻身富裕者行列,进入特权阶层。传统社会毕竟是一个等级社会,各阶层待遇、地位的悬殊差距刺激着人们,特别是农民。而封建时代的科举制也为人们进入士阶层开辟了一条狭窄的路,所以不少家庭、宗族把鼓励子弟后代读书、科考作为最大的愿望。

传统社会的重农、重士政策是统治者依据当时社会的物质条件、伦理标准制定出来的。同时,它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职业趋向。北齐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指出:“夫治生之道,不仕则农”。这种观念,在许多家规、族训中均有反映。宋代官僚吕坤于《孝睦房训辞》中要求其后代:传家两字,曰读与耕^⑥,泰州官氏族谱指出:四业最显惟士,次

① 《商君书》农战第三。

② 《史记》卷30。

③ 《魏书·高宗纪》。

④ 《太祖实录》卷208。

⑤ 《孟子·滕文公下》。

⑥ 《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家范典。

莫如农”^①。明代人徐云重在《明善全编》中说：子孙职业的最佳选择是读书、耕田。即所谓“读书耕田以清贫勤苦立家业，布袍蔬食为士人，令父子兄弟人人礼乐文章”，而最终目的是：“匹夫而缙绅，畝亩而朝列”^②。

更重要的是，在传统民间社会中，重士农轻工商成为一种习俗，影响了华夏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百姓。兹略举几个典型事例：山西兴县，“士闭户自守，农夫力穡，崇岭峻阪，无不耕植，工无奇技淫巧，乏富商大贾”^③。临汾，百姓“居不近市，女不向衢，士民有分，男女无杂，勇于纳赋，耻于游食”^④。山东历城，重农桑，崇学业；长山县：民无游惰，务农桑而轻贸易。浙江定海：“民俗古朴，鱼盐耕读，各安其业”^⑤。江西九江一带，“百姓俗尚农业，罕事工商”^⑥。此种状况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广大地区的真实面貌。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即传统社会中士虽然是受人称羨的阶层和职业，而其人数却十分有限。在科举时代，可称得上士人者只有进士、举人、贡生、监生、生员。笔者曾对清代这几类人作过统计，一个县中同一时期总共有500人左右^⑦。当然，当时的读书人远不止这些。但如果读书人不能取得士人之衔，其中大多数人也都要为生计而耕耘田亩，而不能算作完全的士人。由此看来，一个县中的数百名士人与数万、十几万农夫相比，是微乎其微的。这就告诉我们，传统社会中真正获得发展的职业是农业，因而农业人口的数量也占有绝对的多数。

我们认为，传统社会中农业从事者过多是人口增长快的重要原因，农业生产者由于直接参加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是生产物的第一掌握者（对自耕农来说尤其如此）。他们能较容易地用自己的产品去供给子女享用；加之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标准很低，所以农民较少体会到生育抚养子女的艰难，因而抑制人口增长的意识便无从产生，另外。传统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常使农民无法

获得稳定的收成，所谓“竭力耕稼仅足一岁之用，一遇水旱辄至艰食”^⑧。这是全国许多地方的写照。农民没有剩余物品供自己作其它享受，更缺少积攒钱财为自己年老时作准备的能力。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多生子女，进行这种活物的投资。

四、传统文化与人口的流动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口也曾有过规模宏大的迁移举动，如西晋、唐末、两宋之际等。然而，这些迁移的背景多是由于战乱，百姓为逃生而不得不弃离家园。其实，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百姓更乐于固守家乡的热土，即以安土重迁为其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百姓从事比较单一的农耕活动，以此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因而与外界的交流的愿望不大强烈。流动的行为很少。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论。实际上，中国地域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差距很大。其间有平原，有山区丘陵，还有滨河临海之地。即使在同一个人群中，人们也会因年龄、志趣的不同而希望从事不同的职业。这些本应该成为产生人口流动的条件或原因。然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着诸多限制、禁锢人们流动的因素。

先秦时期，老子曾描绘出这样一个生活环境：“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或者“重死而不远徙”^⑨。与老子有所不同，孟子主张，百姓“死徙不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① 《泰州宫氏族谱》。

② 《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家范典。

③ 《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1。

④ 同③。

⑤ 马瀛等纂《定海县志》卷2。

⑥ 嘉靖《九江府志》卷1。

⑦ 见《人口研究》1989年第3期。

⑧ 嘉靖《衡州府志》卷1。

⑨ 《老子》第八十章。

持”。^①由此可见,如果说老子希望建立的是“个人主义”的封闭生活环境的话,那么孟子憧憬的则是“集体主义”的封闭世界,则在不流动、拒迁徙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当然,老子的理想除了在一些“隐士”身上得到体现外,并没有被广泛推行开来。而孟子的蓝图却被付诸实施,成为他以后两千余年百姓的生活方式。以至人们视一乡一地的不流动行为美俗而大力宣扬,如中原一带,“地宜耕桑,习俗纯美,质而不华,俭而不侈,安于田里,不事远游”^②。安徽池州“民业渔耕,地未尽利,大概士夫崇恬退……,土著之民惮远行,不事贸易”^③。浙江象山,“黔首(指百姓,引者注)守田亩,跬步不出里巷,妇人耻入市,即穷檐陋室未尝见颜色”^④。湖南常德更典型,“人气和柔,多淳朴少宦情,以黄老自乐,有虞夏遗风……居民务本,勤于耕织……安乐故土,惮于行役”。^⑤而具体到一般百姓,终身不入城市,未见官长者更不在少数。

封建时代,统治者为了政权的稳固、秩序的和谐、管理的便利,从政策上限制甚至禁止百姓流动,有意制造互不联络的封闭社会。然而,对百姓流动影响最大的是来自宗族、家庭的力量。

由具有血缘关系的人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宗族是中国百姓的主要居住形态。宗族观念、意识的强烈大大抹杀了人们的迁移流动倾向。世世代代聚族而居成为一种美德受到社会的敬重,统治者也常加以奖赏,因而又形成另一种浓重的习俗。浙江临安:“俗重迁徙,数十世不忍析居”^⑥。湖南洞庭一带百姓“聚族而处,久成巷陌,死徙无出境”^⑦。安徽石埭:“一族所聚,动辄数百或数十里,即存城中者亦各占一区,无异姓杂处。以故千百年犹一日之亲,千百世犹一父之子”。可见,宗族力量的强固既限制了本宗族成员的外迁,同时又对其它非本族成员的迁入持排斥态度。固然,宗族意识减少了其成员的

流动行为,而宗规、族训又是这种意识和行为维系的主要力量。前面所提到的宗族对其成员职业的限制就起到了这种作用。宋代诗人陆游在其所撰家训中说得明白:“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足矣;能布衣草履以事农圃,足迹不入城市大是佳事”^⑧。家规、族训对其族人的制约力量要大大超过政府的政策。

传统社会的家庭观念,特别是孝的伦理对人们的流动起到抑制作用。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家庭的和睦,而这种和睦是依靠非常严密而相互制约的家庭成员关系来维持的。《礼记·礼运》云:“父慈子孝,兄敦弟悌,夫义妇德,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义”。还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易经·彖》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这种和睦气氛建立的前提是父子、兄弟、夫妇终年在一个圈子中生活,互相提携、照料。子孙对于父祖的孝行又是家庭诸关系中最重要。的。“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顺亲”^⑨。按照孔子的要求,要尽孝就应做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分”^⑩。亢仓子在《训道篇》中指出:“夫善事父母,敬顺为本,意以承之,顺承颜色无所不至,发一言,举一意,不敢忘父母;营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⑪。“告面礼”成为许

① 《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

② 嘉靖《大名府志》卷1。

③ 嘉靖《池州志》卷2。

④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点》上篇卷3。

⑤ 《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6。

⑥ 光绪《临安县志》,风俗。

⑦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五。

⑧ 光绪《石埭桂氏宗谱》。

⑨ 《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家范典。

⑩ 《朱子全书》。

⑪ 《论语·里仁篇》。

⑫ 《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家范典。

多宗族的规定,即“为人子者,出必告,返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①。那些久别父母的人无法“顺承颜色”,照料起居,因而很容易被人视为不孝。所以说,中国的家庭伦理是一种限制流动的文化。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即中国家庭的财产继承制度。中国自古至今,子孙对父祖财产的继承基本上采取均分的方式。如唐代所定法律中明文规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②。我想这种制度产生的根源还在中国的早期文化中。正如上面所述,早期文化对家庭的要求是和睦共处,家庭的聚居的规模越大越好。而在实际生活中,大家庭又是难以维持的,兄弟分异不可避免。既然和灶共食的家庭不能维系,那么,分分离时也不会使兄弟“失其和”(此“和”指和气)。均分财产是达到这种状态的主要手段。同时,这种继承方式也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仁政”思想。而在西方文明中则不是这样。西方许多国家在前工业化时代基本上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即土地等主要财产由长子继承,“其它的已婚子女只是继承一定份额的遗产独自地建立自己的家庭、自由寻找他们的处所”^③。后者往往离开家乡到外地去谋生。自然产生了人口流动;而中国的财产分配只是使原有的财产规模变小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地理位置的变动。

商人本来是一个流动性较强的阶层,然而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商人虽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却没有社会地位,更谈不上政治地位。因而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把积蓄的资金投入到家乡的土地上,重新过不流动的田舍翁生活。明清时期的徽商、晋商等就是这么做的。

传统社会中这种封闭的、固守家园的生活习性给中国人口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首先降低了人口的身体素质。在这种不流动、封闭的环境中,人们的婚姻范围狭小。

传统社会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龄男女择偶的主要方式。由于活动范围有限,父母、媒妁也只能于三乡五里的社区圈为青年男女物色对象。如此一代一代下去,血缘联系很近的人也互成婚配对象。在不少地区,姑表、中表结亲具有一定普遍性。由此而导致各种遗传病症。同时,在中国一些地方,由于水土等原因而存在各具特色的地方病,而封闭的生活方式,狭小的婚姻圈又进一步降低了人们抵抗疾病的能力。这些最终降低了人们的身体素质。

其次,阻碍了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这里的文化素质主要指人们的变通能力,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改变环境的意识等。在封闭的环境中,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很少。人们世世代代固守一种生活方式,整个社会因而缺乏活力,变革更无从谈起。长此以往,人们形成了一种痼习,把外界新事物视作左道旁门予以排斥。

第三,促使生育率提高。传统社会的封闭性和不流动性使人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带有自然色彩,生育则更是如此。传统社会中的农民四季身履田亩,与妻子终日相伴,而不象商人那样具有较大的流动性,由此促使生育率上升。另外,中国历史上家庭财产的均分制度,使人们在结婚分家之时都能得到一块田产。因此,他们较少体会到生活的压力,不会主动抑制生育;而西方和日本的长子继承制所造成的其他子女的流动,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生育率。

最后需要指出,传统社会人口的不流动是有限度的。一个地区随着人口的增加,平均土地拥有量的减少,人们便无法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继续生活下去。如江南许多地方至清代,“太平日久,人民户口百倍于前,

① 吴云:《得一录》卷九。

② 《唐律疏议》卷12《户婚》。

③ (美)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P22。

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山无不采之木石，而终不足以供人之用”^①。由于社会缺乏对这种状况的调整机制，一遇天灾，百姓或者坐以待毙，或者揭竿而起，或者逃离他方成为流民，彻底打破了这种封闭的世界。然而流传他乡的百姓重新寻找到一块土地生活，所建立的是又一块封闭的世界。传统社会因而陷入这种周期性震荡之中。

五、结 语

美国文化学专家L·A·怀特指出：“自从人类历史的远古时代以来，人类的每个成员一出生便被投入到一个信仰、习俗、工具和艺术表现等构成的文化环境之中，以及由气候、地貌、动植物群落所构成的自然环境之中。这一文化环境是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种传统。它可以垂直地一代代地继承下来，也可以横向地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②。中国传统文化的运行轨迹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理论。我们在上面主要是对中国农业社会中传统文化对人口的影响进行审视的。那么，这种文化对我们今天的人口发展是否仍在产生作用。回答是肯定的。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我们今天的社会既非完全的农业社会，也非完全的工业社会，而呈现出两种社会交织的形态。从人口结构上看，中国目前农业人口仍占近80%。当然，我们今天的农业社会与传统的农业社会有很大不同，工业文明的触角已经伸入其中。但是在广大农业地区，传统的耕作方式、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而传统文化的一些方面仍然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职业行为、迁移行为等方面产生作用。面对传统的影

响，我们也并非无能为力，坐等工业文明的彻底实现。中国解放后四十年的历史表明，我们用晚婚，节制生育，计划生育的政策去引导人们的生育趋向，使多育多子观念的影响大大减少，降低了生育率。在民间，我们用新的基层政权来取代宗族组织，弱化了宗族观念；用新的家庭平等关系去代替唯父母命是从的传统孝道，因而减少了对人们流动行为的限制；用男女平等的思想来清除男尊女卑的观念，并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行为。同时，也应看到，这些工作都是初步的，而我们用政策对人口行为施加影响的许多方面是靠强有力的基层政权协助和在对人们利益的直接掌握下进行的，而一旦这两个条件消失或不完全具备，在目前社会状况下，我们就可能在旧有观念力量逼紧下后退。因而，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新的方式，巩固已有的成果。

站在今天反观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也应看到，它有不少可以汲取的成份。诸如家庭养老在传统社会中受到高度重视。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种行为代表了时代的方向，相反，社会养老或老年人靠自己过去的积蓄自养才是工业社会的特征。但在我们这个复合形态的社会中，家庭养老的作用仍很重要，因而有必要强化这种意识。

（本文责任编辑：汪正鸣）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① 乾隆《吴县志》卷5。

^② （美）L.A.怀特《文化的科学》P161。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